

二. 到達中國；初步商談

我到達中國在上海稍事停留，即於12月21日前往南京，蔣委員長和蔣夫人在南京接見了我。我到達南京的當夜與蔣委員長第一次談話時，竭力向他坦率地指出我國政府對中國局勢的態度，以及我國政府希望看到中國早日實現統一與和平。我向他明白表示，美國人民強烈反對自己政府捲入別國內部爭鬥的任何行動，美國人民首要的利益在於世界和平，雖然他們對中國人民懷著偉大的友誼，但除非他們看到確實的證據，證明目前進行的努力能獲致和平解決中國內爭的成功，否則他們將不允許總統繼續對中國軍事援助與提供經濟援助。

蔣委員長在回答時，先表示了他對我談話的重視和對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聲明的讚許。他強調了國民政府尋求以和平方式解決中國內部問題的決心，並指出，總統聲明中提到的取消中國自治性軍隊，例如共產黨軍隊的必要性，是極為重要的部分。蔣委員長斷言，蘇聯與中共之間存在著明確的聯繫，中共在廣泛的政策方面依靠蘇聯，蘇聯已在滿州用武器裝備的方式援助中共，中共犯了無誠意且實行拖延戰術的罪行。他描述了蘇聯在國民政府軍隊於大連、葫蘆島、營口登陸的問題上，以及在長春設立國民政府參謀總部的問題上的不友好、不合作態度。他指責說，蘇聯的目的是在滿州建立一個中共控制下的傀儡政權，在滿州的蘇聯司令官有意拖延從滿州撤走蘇軍，根本是為了援助中共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像該司令官公開聲明的那樣，是應中國政府之請。

我較為詳細地描述了這次談話，因為這次談話從許多方面指明了中國的全部局勢。一方面，國民政府畏懼且不信任蘇聯，並確信中共是蘇聯的傀儡；國民政府不相信中共的誠

意和真摯。另一方面，中共也同樣不信任國民政府。在後者表示願意放棄一黨統治並建立一個聯合政府時，中共也並不相信他們的誠意。他們擔心政府的特務機構，除非他們在政府裏得到一種發言權，足以充分保證他們政黨繼續存在和黨派活動的自由，不然他們就不願交出他們的軍隊。支持這種擔心和不信任態度的是，雙方都堅信對方圖謀單獨完全控制政府。這種由兩個對抗的政黨間的擔心、不信任和懷疑所造成的障礙，已成為中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最大阻力，這種障礙是國共兩黨之間經過多年的鬥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

在我居住重慶的初期（我於 1945 年 12 月 22 日到達重慶），我盡力接見一切來訪者，這些人希望同我討論中國的局勢，有的我覺得有適當的理由這樣做，有的是合法組織的代表。在這些來訪者中，有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國青年黨的代表以及中國許多其他組織的代表。在我抵達中國之後，除了有川流不息的來訪者到我寓所來，我也收到了從全國各地寄來的大量中國人的來信。絕大多數這種來信都證明，中國人民明白他們的國家處在危急之秋，許多來信憂傷地設想，中國的命運只有寄託於我出使任務的成功。這種態度表明了當前許多中國人的心理狀態，他們看不到自己的國家有什麼希望，除非通過美國的影響。我相信大部分中國人民都歡迎美國幫助尋求一種和平解決中國內部問題的方法，這種蘊藏著的中國人對美國的善意，是這個國家足以使我們增光且能實際感受到的寶貴財富，是一種存在於意識形態和政治黨派領域之外的因素。

我第一次會見中共代表是在 1945 年 12 月 23 日，當時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將軍、中共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將軍和中共中央委員董必武先生都來到我的住處拜訪我，歡迎我來到中國，並表示中國共產黨對我出使任務的重視和讚許。在談話中，中共代表強調他們希望停戰，並希望建立一

個聯合政府，其基本原則他們認為應在即將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加以確立。他們指出，在這個政府領導下，軍政管理都會實現統一。我留意這次談話，因為它顯示了國共兩黨間觀點的另一種基本分歧。國民黨爭辯說，統編共產黨軍隊為一支國軍應在聯合政府建立之前；共產黨也同樣堅持組成一個他們在其中有真正發言權的聯合政府，這是將他們的軍隊統編為一支國軍的先決條件。每一方都在總統的美國對華政策聲明中尋找足以顯示自己態度正確的證明。

三．政治協商會議

由於召開包括中國各主要政黨代表的國民會議以實現中國的統一，是我出使任務的主要目的之一（總統曾在 1945 年 12 月 15 日的信中特別提出），因此說明一下政治協商會議的背景似乎是有必要的。

設立政治協商會議，是 1945 年 9 月間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在重慶舉行的會談中規定的。因此 1945 年 10 月 11 日公布的《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第二項包括了這一方案，原文如下：

（2）關於政治民主化

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應先採取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現雙方正與各方洽商名額組織及其職權等項問題。雙方同意，一俟洽商完畢，政治協商會議即應迅速召開。